

# “现代性”研究的回望与反思

陈嘉明

[厦门大学,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现代性; 启蒙思想; 自由主义

摘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对现代性的研究构成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 其论争的焦点关涉到两个根本的问题: 一是有关中国国情及其相应的现代性性质的判断, 二是有关西方启蒙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普适性问题。反思这段时期的研究, 它基本上属于借用西方的有关概念与框架来分析问题的阶段, 这一情况在有关“自由主义”思想的实质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的理解上显得尤为突出。现代性研究方面的困惑, 说到底在于我们无法从哲学的层面上提供一种概念框架, 以帮助人们从学理上将“问题语境”、“普适性”之类的难题说清楚。

中图分类号: C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511(2009)01-0067-10

有关“现代性”的研究, 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文革结束以后, 虽然也有过关于人道主义、主体性、市民社会、人文主义精神等问题的探讨与争论, 但尚没有一个概念能够像“现代性”这样, 提供了一个容纳对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探讨的概念空间。正因为如此, 现代性概念才引起了学人们的普遍关注, 从而引发了各领域对现代中国的全面思考。目前, 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学科涉及面广、参与的学人众多、争论的问题激烈、持续的时间长久等特点。本文拟就这段时期国内学术界有关现代性的研究状况进行一番回望, 特别是对民间思想界的有关争论进行反思, 这或可从一个侧面有助于了解我国哲学研究走过的路程, 同时, 也有助于了解其中所包含的进步以及存在的问题。

## 一、现代性研究的简略回顾

虽然我们难以确切地说, 自 1978 年以来, 到底是谁以及在什么文章中首先使用“现代性”概念, 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流行于 1990 年代, 并以汪晖的文章《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为争论的契机, 使这一研究达到一个高潮, 则是一件确凿无疑的事情。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能在中国“热”起来, 自然有其社会与思想方面的背景, 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 显而易见的是, 中国社会本身自改革开放以来便进入了现代化的加速进程, 它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巨大变化, 使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事实, 无疑刺激着学者们对中国的“现代性”究竟如何以及将来应当如何的问

收稿日期: 2008-06-14

作者简介: 陈嘉明, 男,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题进行探讨。其次,由对这一现实问题的思考的进一步延伸,产生了对中国历史上的“现代”想象(包括观念、意象、图景等方面)进行梳理的需要,<sup>①</sup>以及对深刻影响着中国这一现代性进程的西方有关学说进行探讨的需要。另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进、介绍,以及它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也从特定的角度激发了人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兴趣——无论这种兴趣是出于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最后,现代性研究也可说是“现代化”研究的一种自然延伸。“现代化”研究作为一种侧重于从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方面进行的有关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探讨,它的进一步深入,自然要前进到现代社会形成的哲学与文化基础的层面,包括人的观念(“人是什么”),基本的价值系统(如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思想与行为的方式(如合理性)等深层问题。

与此前中国社会科学界曾经发生过的关于异化问题、主体性问题、市民社会问题<sup>②</sup>等的讨论相比,“现代性”概念是一个涵盖面更广、理论含义更深刻、内容更丰富的概念,因此它为学者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探讨空间,也由此吸纳了更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产生了一批反映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可大致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术意义上的梳理工作,包括对中国以及西方的现代性思想进行梳理。在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梳理方面,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4),2卷4册140多万言,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堪称一部力作。该书从思想史的角度,尤其从“天理世界观”与“公理世界观(科学世界观)”的概念出发,试图提供对“现代中

国”与“现代中国思想”的内涵的解释,包括地域观念、主权意识、知识体制、现代认同等,以求最终达到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解。高瑞泉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2005)把“进步、竞争、创造、平等、民主科学、大同式的社会理想和平民化的人格理想”等解读为中国的现代精神传统。它要追问的是,在当代文化与古代文化之间发生断裂之后,其断裂带后面的新生代文化有哪些被保存了下来?它们又是如何结成贯穿一个多世纪的思想链条,从而活跃在当今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中的?

西方现代性思想方面的梳理工作,包括了启蒙学说、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等内容,以及对马克思、韦伯、福柯、利奥塔、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刘小枫的《现代性问题的累积》(1998),该书的主要旨趣在于探究“现代结构”的要素与特征,个体信念及其言说与知识学及其社会性的关系,现代性论域中的“怨恨”问题,以及宗教与两种不同的民主政体(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等。陈嘉明等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2001)关注的则是哲学的层面上的,叙说从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性态度的纲领”开始,经由尼采、海德格尔等对现代性哲学的批判,哈贝马斯的辩护,直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后现代性哲学思潮的产生,由此勾勒出了一幅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观念演变的图景。

二是对当今中国现代性状况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仍是以汪晖为代表。他先后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

<sup>①</sup> 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正是对于“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的“基本的思想主题”。[1](P420)

<sup>②</sup> “市民社会问题”的探讨,亦可说是属于问题研究的一个方面,因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按照有的学者的理解,其也属于“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范畴。[2](P3)

题》(以下简称《状况》)、《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等论文,其中尤以《状况》一文反响最为强烈。该文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结果,先是发表于韩国,后刊登于《天涯》杂志。该文在国内发表后赢得了一些评论者的赞誉。有人称赞它对中国问题的反思是“全面的和发人深省的”;<sup>[3](P238)</sup>有人则给与了作者高度的评价,认为虽然参与现代性问题讨论的学人不少,“但客观地说,相对真正达到系统性和深刻性的,也就汪晖一人”。<sup>[4](P194)</sup>但该文的发表更多地是引发了一场民间思想界的论辩,这一论辩形成了1990年代中国现代性研究的高潮,甚至造成了民间思想界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野与交锋。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翻译方面的丰硕成果,它们为现代性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源。这其中包括:周宪等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2003-),曹卫东翻译的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2004),徐向东等翻译的《启蒙运动与现代性》(2005),汪民安等主编的《现代性基本读本》(2005),等等。

## 二、现代性研究的主要论争之点

在这场有关现代性研究的热潮中,思想火花的产生大多来自围绕上述汪晖的《状况》一文进行的论辩。这场论辩关涉到的根本性问题,一是有关1990年代的中国国情及其相应的对现代性性质的判断;二是有关西方启蒙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普适性问题。前者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问题的前提,后者则关涉到理解中国现代性的立场与观点。

### 1. 中国的国情及其相应的现代性性质

由于现代性原本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加之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发生也是“外源性”

(也有称为“植入型”)的,因此有关中国现今的特定国情如何,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很自然地就成为了学界探讨的一个焦点,并且它构成了1990年代国内现代性反思各派的主要分歧所在。

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与制度状态,曾经一直是比较单一的,可以简单地给它们冠以某种“主义”类型。往昔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文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皆是如此。不过到如今这一状态已变得大为复杂了。赵汀阳曾经这样叙说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况:“当下中国社会是一个尤其难以理解的社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组合,它有着从接近远古的社会、传统社会到发达的近代社会的各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有着从前现代、现代到极端后现代的精神和观念;有着古代的各种权术和现代的各种骗术,有着从自信到自卑、开放和保守、自由和专制、贵族和民主……甚至,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关心伊拉克、南斯拉夫和爱尔兰问题,德里达、哈贝马斯和布尔迪厄在中国比在西方更出名,如此等等。最大限度地胡乱包容着许多时代和各种生活,这种情况产生了荒诞而真实的中国经验。”<sup>[5](前言)</sup>

赵汀阳的上述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使用的是散文式的笔调来描绘当代中国社会。同样,我们在汪晖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叙说。他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进入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从思想的层面上看,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在,首先是许多产生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的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使得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将这类问题视为中国传统的腐败;其次是在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市场社会基本形成,国有企业比例大为下降,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使得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再次,全球化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将其经济和文化的生产过程纳入到了全球化的市场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包括政府行为本身,已经不能在单一的中国语境中加以分析。在汪晖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现象的这种复杂性,才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即“知识群体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变得含混起来”。<sup>[6](P85)</sup>

同样,也正是由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一些学者才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认同了辨析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例如,徐友渔将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立场和观点的分歧与对立概括为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是“中国目前情况如何”,其次是“中国未来应当问何处去”。<sup>[6](P425)</sup>而汪晖则使用了另一种比较具体的表述方式,即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的讨论“最终要回答的问题”在于,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独特性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有没有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陶东风也认为这方面的有关争论,乃是“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sup>[7](P48)</sup>

我们先来看看汪晖对上述问题的考虑。汪晖意识到,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我们“显然无法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概念来简单地加以解释”。<sup>[6](P111)</sup>在他给出的分析中,他也力图分辨出当今中国社会所包含的各种不同成分,包括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纳入全球性的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等等,从而把中国社会解释为具有多种不同要素的复合体。在他看来,这种复合体一方面是“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它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sup>[6](P88)</sup>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主义”

仍然是中国现代性的基本性质,虽然这种社会主义是“必须重新定义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化的社会”,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sup>[6](P106)</sup>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已经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

诚然,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形态,汪晖作出了现象上的描述,但是这样一种复合体在总体上究竟是什么?作者是否能够像韦伯那样概括出某种“理想类型”式的概念(如“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传统主义”等)来加以解释呢?汪晖其文汪洋恣肆,只可惜概念抽象力不足,在这方面稍逊一筹。<sup>①</sup>因此导致的结果是,面对复杂的现实,他难以自如地从理论上加以驾驭,而表现出某种力不从心的状态,因此,对于当今社会中国的社会形态问题,汪晖依然需要借用已有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概念来加以解释,而不能在概念上给出新的概括,提炼出新的概念,从而在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质这一他视之为“最终”的问题上,他本人最终还是没能给出明确的回答。应当说,这种局限于现象层面的描述,而不能上升为概念层面的把握,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普遍缺陷。

对汪晖上述关于中国国情性质判断的一个严厉的反驳,来自于徐友渔的《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一文。源于分析哲学的功底,徐友渔擅长概念分析与逻辑演绎,文笔犀利。他的策略是抓住对方概念上的含混之处,攻其一点,势如破竹。他把汪晖这方面判断的分歧,提升到“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两种思想对立的高度。他批驳汪晖对这类分析的根本错误在于不是

① 叶隽曾批评汪晖“仍让人觉得他的思想‘原创力’不够”。<sup>[8](P40)</sup>在笔者看来,这种“原创力”的不够,说到底还是在于根本上缺乏某种自己的“元概念”。

从事实出发，而是从理论出发，“把西方左派关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知识 and 概念运用到中国，对中国的国情进行变形和套裁，使之适用于当代西方新左和新马的分析框架”。<sup>[9] (P427)</sup>这种做法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汪晖刻意把中国社会的性质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把“对中国问题的诊断说成是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因为在徐友渔看来，只有设定这样一个前提，汪晖才能将西方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套到中国的问题上来。

徐友渔与汪晖的判断不同，他明确地认为，就“社会性质和政治制度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立以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它的“社会和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革命、没有断裂、没有质变”，也就是说，它全然不是汪晖所看待的那种资本主义状况，而是仍然属于社会主义的，虽然徐友渔也认可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国情的这一性质的不同判断，在徐友渔看来，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的“分歧关键之处”。<sup>[9] (P428)</sup>

徐友渔之所以把这一分歧看作是关键的，这是由于它会导致对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认识不同，进而导致社会关注与批判目标的不同。徐友渔指出，作为对国情误断的逻辑结果，汪晖“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内部引开”，使之指向某种资本主义问题，从而实际上造成一种“舍近求远、避实就虚”的结果。<sup>[9] (P430)</sup>而对于徐友渔的关注点来说，“左”的危险依然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因此他提出，研究当代中国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么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看到权力在适应市场时的灵活善变，并从中捕捉到它的新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考虑市场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模式结合的可能性，它以一种畸变的形式支撑和延续着

这个模式。这两个方面说到底，都是要防止“在社会主义名目下搞极左的一套”。因此，从思想、理论上认真、彻底地对这套左的东西进行清理，乃是“尚未完成但必须完成的任务”。<sup>[9] (P426)</sup>

在对国情的认识上，王思睿提出的是另一种主张。与徐友渔讲“主义”不同，王思睿的基本思想是不谈“主义”。在他看来，汪晖所谓站在批判“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高度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批判态度”，<sup>[10] (P304)</sup>它掩盖并消解了真正的中国问题。王思睿主张，真正的中国问题是大量有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诸如混合经济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村土地问题，直接选举问题，报刊民营问题，等等。在他看来，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建树甚少，“主要原因并不是在引进批判学派等西方时髦理论方面努力不够，而是自身调查研究的功力不够，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sup>[10] (P305)</sup>

王思睿的思路不免使人联想到胡适的主张：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不过，固然那些具体、现实的问题需要研究，但“观察渗透理论”，如果要深入地谈问题，实际上仍避免不了“主义”。以“农村土地问题”为例，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是集体经营还是个人承包，背后都离不开“主义”。以研究现实问题来否定对诸如中国国情、现代性的性质之类的大问题的研究，这样的否定说不上有什么道理。实证性的研究固然重要，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何尝不重要呢？实际上，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落后状况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的阻碍，远比具体问题研究方面的落后要来得严重。且不说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需要向西方寻求真理，即使是现在的现代性研究，借用的仍然是西方的理论框架与概念。

在由国情而引发的“主义”问题上，

中国的一些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国际上吉登斯、布莱尔等人的影响,从而引发了他们对“第三条道路”的憧憬。学者们之所以产生这方面的设想,一方面是源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与主张有其重合之处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特定国情(市场经济加社会主义的现状)的判断以及如何化解学术界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的考虑。在这方面,就国内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而言,有的学者(如许纪霖)认为,从整体上看,“自由主义”因为只信奉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因而显得太“右”了;而“新左翼”又拒斥自由、宪政的所谓“资本主义”的价值,又显得太“左”了。但就西方的自由主义与“新左翼”本身所追求的目标来说,它们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在这两者之间,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超越其间的‘第三条道路’”。在许纪霖看来,这样的结果也已被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资本主义逐渐地融合了社会主义”,以及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极的相互内化与融合的“历史经验所证明”。<sup>[11](P78)</sup>

在思想上认同某种“第三条道路”倾向的还有秦晖。这种认同的因素,除了同样肯定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具有重合的价值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强调之所以需要这种合二为一式的选择,是中国所面临的特定“问题情境”使然。在他看来,时下中国的这种问题情境“近似”于“自由秩序建立前的沙俄”,这就是,“自由的缺乏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太多,社会民主的缺乏也不是因为自由太多”。因此类似地,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面临的并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的状况,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这种特定的情境决定了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与从社会民主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

必要的。这就意味着,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这两个立场的“价值重合面”是很大的。因而秦晖提出,要坚持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肯定的那些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否定的那些价值。至于那些为自由主义所肯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否定的东西(如“纯粹市场经济”),以及那些为自由主义所否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肯定的东西(如“过分强大”的工会),则由于就目前中国的情境而言,这类现象尚未产生,因此还轮不到谈论它们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秦晖认为中国现在需要寻求在追求更多自由的同时,也追求更多平等的、可视为“第三条道路”的原因。

最后,笔者想要提及的是有关中国现代性判断方面的一种特殊观点,即宣称中国的现代性“已经终结”,中国已进入“后现代”的所谓“后学”观点。一些论者已经指出这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文化观念的影响,而生搬硬套于中国现实之上的不当解释。确实,在笔者读了中国“后学”方面的代表作<sup>[12][13]</sup>之后,深感它们应属于现代性研究中的说法浮夸、逻辑混乱之类的文章。这里仅举两点以证之。首先,就这类文章的核心论题“现代性的终结”而言,它们所给出的主要理由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与“小康”目标的提出。在这类文章的作者看来,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对‘现代性’设计的全面认同,而是面对后工业文明的新的选择”,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后现代”的东西。但实际上,市场经济恰恰被理解为现代性的要素之一。此外,作者还将“小康”看作是“一种跨出现代性的、放弃西方式发展梦想的方略”,亦即它是一种“超越”了现代性的“发展观”。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中,“小康”这一用语原本指的是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按人均计算达到800至1000美元这样的经济指标,亦即

达到某种初步富裕的社会发展阶段,这当然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但它与“放弃西方式发展梦想”又有什么相干呢?从这样的经济指标上,我们又如何能得出它的“跨出现代性”的结论呢?显而易见,“后学”作者给出的这些理由,不但不充分,而且还适得其反,属于以其矛攻其盾的东西。

不仅如此,这类文章中还有一些相当随意性的说法,如:“西方他者的规范在中国重建中心的变革运动中,无意识地移位为中国自己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在这里,‘他性’无意识地渗入‘我性’之中。”并且作者认为,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如下事实:“中国的‘他者化’竟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变革的过程往往同时又显现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sup>[14](P11)</sup>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西方的规范怎么可能“无意识”地“移位”为中国的规范?这里且不说是否西方的规范成为了中国的规范,单就“无意识”的说法而言,就显然已经违背了常识。“规范”之为规范,就是指人为设定、建立的——不论是道德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人所共守的东西。既然是“人为的”,就应当属于人的有意识所为,而不可能是“无意识”的。说规范是无意识的结果,就好比说法律来自于梦幻。再者,说“中国的‘他者化’竟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作者又何曾举出什么事实根据?这种定性式的根本判断,又岂能既不经事实的归纳,又没有概念的分析,就能随便说说的?<sup>①</sup>

这类文章一出手就是“宏大叙事”,说什么中国的知识型从古代到现在是两种类

型:古典型与现代型,而今在经历了所谓的从“技术主导”到“文化主导”的五个阶段之后,“现代性”的知识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已经衰微和终结,于是“水到渠成”,新的知识型——“中华性”便应运而生。殊不知这种构造宏大叙事的方式,正是“后学”们所推崇的后现代思想所要特别加以颠覆的东西。现今中国学术为人所普遍诟病的最大问题是“浮躁”,中国“后学”的这些文章,可以作为这种学术病症的例证。

## 2. 西方的启蒙话语是否具有普适性

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是启蒙的价值观念哺育下产生的,因此,只要谈论现代性,就必定得面对启蒙话语的有效性。在国内有关现代性问题的论争中,由于启蒙思想在国内学术界所具有的影响力,因此启蒙观念的普适性问题就构成了论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内这方面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与汪晖作出的中国“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性衰落”的论断有关。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汪晖在肯定了诉诸于西方启蒙思想的、活跃于1980年代的中国“新启蒙思潮”的历史作用,即它作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对封建传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与其他思潮一起“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证明”<sup>[9](P100-117)</sup>之后,对新启蒙思潮加以否弃。这一否弃是基于如下的判断:由于现代国家体制、政党政治、工业化过程,以及由之产生的社会专制和不平等“主要是一种‘现代’现象”,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

<sup>①</sup> 我们还可以顺手举出更多的例子,它们同样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概念与表述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如,“‘国民性’不是一个对中国本质的真实刻画,而是西方话语通过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的文化的‘他者化’”;<sup>[13](P106)</sup>“救亡则是建立民族的自我本质……的策略”;<sup>[13](P108)</sup>“‘现代性’的终结不是一个西方文化的问题,而是我们自身的语言/生存的产物”;等等。<sup>[13](109)</sup>

的一部分”，因此其问题的复杂性，包括“无处不在的资本活动和极为真实的经济关系”，既非简单地用传统/现代的二分对立框架所能分析，也非诉诸于某种人文关怀的“道德姿态”所能解释。因而他断言，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并逐渐丧失了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的能力。他把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社会现实的根本性变化，这就是，“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过程本身的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因此他的结论是：“在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性衰落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思想的废墟”。<sup>[9] (P118)</sup> 既然启蒙主义的概念与命题被断定为已不适用于对当今中国现代性的诊断与批判，因此汪丁丁将汪晖的上述论断归结为这么一句话——“启蒙死了”。<sup>[3] (P323)</sup>

然而，汪晖的上述论断激起了一些反对之声，它主要来自持守自由主义理念的阵营。

汪丁丁就此专门对汪晖的文章作出了回应，其标题鲜明且醒目——“启蒙死了，启蒙万岁！”

汪丁丁主要是从对启蒙精神的三个方面的意义来作出回应的。首先，启蒙被解释为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对待传统的永恒的批判态度”。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只要有传统存在，就需要有启蒙的批判精神，即使是西方文化融入我们自己的传统，也需要有这种意义上的启蒙批判。所以，在批判传统的意义上，“启蒙的精神是长存的”。<sup>[3] (P270)</sup> 其次，就真理与自由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而言，汪丁丁是以“个体主义”这一自由主义要素来作出回答的。他

认为，自由只能是个体的自由，真理也只能是对“特定立场”的个人而言的真理。这样，自由与真理就在个人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内在联系。进一步言之，之所以要选择个人主义，理由是它比“集体主义”要好。最后，是启蒙的“‘普遍主义’理性”问题。汪丁丁坚持认为它们“在当代中国困境中……仍然适用”。理由很简单，因为选择“普遍主义”比选择“民族主义”要好，后者显得“狭隘、小气、懦弱”，它会导致“对人的异化”。<sup>[3] (P271)</sup> 不过，拿“普遍主义”来作为“民族主义”的对立概念进行比较和选择，似乎并不很恰当，因为民族主义属于政治学的概念，虽然对它有着不同的界定，但从汪丁丁的用法上，可以看出它是被用来指一种褊狭的、从民族本位而不是从世界视角来看待事物的观念。而“普遍主义”则是属于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的范畴，意指的是道德命题、原则的普遍适用性。美国哲学家黑尔(R. M. Hare)曾把它表述为，“凡是对某人来说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事情，它对于任何处于相同处境下的人来说也是正确的(或错误的)”。

启蒙思想可以说在国内有着相当的影响，持守启蒙主义立场的学人不在少数，且旗帜鲜明。单世联就曾毫不客气地指责所谓鼓吹后现代主义的“小后主”们，以传道自任的“后学家”们，以及“无政府主义和保守主义”者们携手合作形成了对“本来就极为孱弱的中国启蒙思潮的包围”。<sup>[14] (P52)</sup> 有些学者则从学理上来论述启蒙思想对于中国至今仍然具有的意义。王宾在《自由主义的双重含义》一文中，着重从“问题框架”的角度论述了这一点。文章认为，虽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并且对国情的认识又有分歧乃至对立，但自由主义的理念是否具有普适性，这取决于它的“问题框架”是否适用。在王宾看来，构成



自由主义“问题框架”的是如下这些问题：如何保证个人自由不在整体幸福中失落；如何解决“本体自我”和经验个体的矛盾；如何整合不同性质的个人权利；如何反抗社会对个人的不合理压制，同时又要坚守社会先在性原则等。他还认为，当今中国已经进入这样的问题框架中，或者说，“三个时期自由主义理念争执的核心问题已在中国出现”，这是“不辩自明的事实”。<sup>[15](P458)</sup>因此，他的文章的核心思想是，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凸显、突出自由主义的问题框架，来为“自由主义正名”；而且为达到这样的目的，自由主义的“启蒙者”甚至还需“接受自由主义的再启蒙”。<sup>[15](P459-461)</sup>

### 三、结语

纵观这一二十年来的国内现代性研究的基本状况，总的来说，还是属于借用西方的有关概念与框架来分析问题的阶段。就像我国在现阶段仍大量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一样，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体水平，目前也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向西方学习的阶段，亦即当年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那样的状况，这种敢于“拿来”，能够“拿来”的状况，相对于曾经的禁止“拿来”、诋毁“拿来”，已然是社会开放的一个结果。

从上面国内现代性研究、论争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看到来自西方的诸多概念，如“现代性”、“启蒙”（自由主义等）、“理性化”、“全球化”、“后现代”，等等。至于中国思想界的许多争论，实际上围绕着的是如何理解、是否接受这些舶来品，亦即如何运用它们来解读中国现实所产生的问题。这样的争论在有关“自由主义”思想的实质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的理解上显得尤为突出。批判自由主义思想的人，

指责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具有必然的联系，并认为自由主义导致权力市场化和社会不公。而捍卫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则否认上述联系，强调个人自由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以及市场作为民主的必要条件；他们认定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在中国的凸显，不在于自由太多，而在于自由太少，等等。

客观地说，即使在这些概念与思想的理解和阐释上有所不同，乃至有激烈的争论与对立，但也正是由于这些概念与思想的引入，才使得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能够在拓展思维空间、开辟新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点、引入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等方面，迅速地推进着我们的研究。就像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有其不可逾越的阶段性一样，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样也需要一个过程。特定的社会现实状况为理论提出了需要解释的问题，反过来，当社会还未进入某种现实状况之前，相应的问题及其解释一般也难以产生。中国目前的社会科学还不发达，是与它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引进、学习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同引进技术的需求一样，都有其必然性。

然而借鉴国外的理论，由于语境方面的差异性，有关的困惑与争论也会相应地产生。从上面所介绍的现代性研究的状况可以看出，这种困惑与争论正是集中出现在“问题语境”和“普适性”问题之上，具体来说就是有关当代中国的国情与现代性的性质的认定，以及西方的启蒙思想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这方面的困惑，或许是源于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力”问题，亦即为具体事例寻找适当的理论的能力，或者反过来说，把已知的理论运用到具体情况之上的能力。由于争论各方的作者之判断力的差别，因此即使是拥有相同的思想资源，但对事实、情况给出的判断（解释）也会有所不同。

不过在笔者看来,现代性研究方面的困惑,说到底还在哲学层面上,也就是说,由于我们自己无法提供类似“语境论”、“特殊”与“一般”之关系等方面的哲学新理论,因此也就无法提供一种哲学框架,以帮助人们从学理上将“问题语境”、“普适性”之类的难题说透彻、弄清楚。对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解释或许在于,时下的中国只有“哲学史家”(在不同程度上了解西方的哲学思想),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未能具有自己原创的哲学思想体系)。虽然我们对早在黑格尔那里就有的、如今德里达还在声称的“中国没有哲学”的言论表示不满,但我们能否令人信服地说,不仅在古代我们有自己的哲学,

而且现在也有自己的哲学呢?

最后,虽然笔者在文章的开头已对这场持续的现代性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出了肯定,但是总体上这一研究仍处于起始阶段。有些或许出自某种顾忌而导致的“避实就虚”式的研究,妨碍了对中国现代性的真实性质与面临问题的读解。总之,在已发表的论著中,深入、严谨的研究成果有限,浮于表面的论著居多,甚至有些被批评为“趋新骇奇、泛言空谈”,乃至还有“胡言乱语”一类。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可以找出一些,但主要的根源其实早已有所共识,即它们都是来自于学风上的浮躁与空疏。

#### 参考文献:

- [1] 李翔海. 民族性与时代性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2] 邓正来. 现代: 法律与立法——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 [A]. 赵汀阳. 现代性与中国 [C].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 [3] 汪丁丁. 启蒙死了, 启蒙万岁! [A]. 李世涛. 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C].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 [4] 姚新勇. 深刻的反思抑或实际问题的放逐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0, (5).
- [5] 赵汀阳. 现代性与中国 [C].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 [6] 汪晖. 当代中国思想状态与现代性问题 [A]. 李世涛. 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C].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 [7] 陶东风. 现代性反思的反思 [A]. 李世涛. 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C].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 [8] 叶隼. 思想史的崛起——读《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Z]. 中国书评.
- [9] 徐友渔.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A]. 李世涛. 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C].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 [10] 王思睿. 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 [A]. 李世涛. 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C].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 [11] 许纪霖, 等. 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 [J]. 上海文学, 1999 (3).
- [12] 张法, 张颐武, 王一川. 从“现代性”到“中华性” [J]. 文艺争鸣, 1994 (2).
- [13] 张颐武. 现代性的终结: 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J]. 战略与管理, 1994, (3).
- [14] 李陀. 让争论浮出海面 [J]. 读书, 1997 (2).
- [15] 王宾. 自由主义的双重含义 [A]. 李世涛. 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C].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卢云昆

## Public Welfare and Noblemen's Privilege: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in Montesquieu's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Locke's

ZHAO Fei

Among the early modern school of natural law, John Locke was the first to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Baron de Montesquieu developed Locke's theory and further improved the theory of the separation of legislature, executive, and judiciary and their mutual restraints. Though the two theorie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y have different ideological trends. The former stresses the public welfare with property right as the center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s the political freedom with the noblemen's privilege as the precondition. Comparatively, though Montesquieu's theory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s better in form, Locke's separation of powers has exerted a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of the West.

## Reflections on the Research on "Modernity" in China

CHEN Jiaming

Since the 1990s, the research on "modernity" has become a focus of Chinese scholars and centered on two key issues, one being the evaluation of the national situation of China and the nature of its corresponding modernity, the other being the universal value of Western Enlightenment and values. The research of this period is mainly a borrowing of related Western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which finds full expression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liberalism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China. The dilemma in this research has its root in the failure in providing a conceptual frame at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in order to give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such terms as "problem context" and "universality".

## An Interpretation of Scott's Landscape Image as a Romantic Imagination

ZHANG Jian-fei

Romantic writers are enthusiastic about the depic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s which they regard as "Muses" or "religion" in order to arouse the worship of the readers. To such writers, the depic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s is not a simple reproduction of natural scenes but a way of imagination for expressing their emotional, cognitive and cultural concerns. Through a scrutiny of Walter Scott's Scottish historical novels (mainly *Waverley* and *Rob Roy*) and the relevant socio-cultural contex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how landscape turns into three aesthetic concepts "romanticized" by imagination and enters the individual aesthetic experience as a spiritual resource.

## A Reinterpretation of Aristotle's Mimesis Theory

XU Ping

This paper giv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Aristotle's mimesis theory and holds that there is no clear evidence in his *Poetics* to support the dominant idea that "poetry is an imitation of the reality". A scrutiny of his *Poetics* and the objects of his imitation will reveal that imitation is not a "copy" of the reality but a creation by following the natural law, nor an imitation of the "original" reality but a pursuit of the goal in poetry. Either art or literature has its own relation to nature or reality, which cannot be explained by "copy".